

第五章

窄化的再生產

—中共性別意識形態中的父權障礙

本章以前篇討論作為基礎，討論在一胎化政策所呈現出的中共性別意識形態中所呈現的父權面向。一胎化政策假設婦女會因再生產的降低而投入生產，這種論述的基礎主要繼承自恩格斯的解釋，然而在恩格斯的脈絡中，婦女可以因為投入公領域生產而提昇地位的前提是共產主義社會中家庭的崩解，然而當改革開放的推行而重新穩固家庭意義時，婦女的負擔會減輕嗎？只以減少生育來解釋婦女的再生產，是不是對於再生產意義的窄化？當中共以提高生產力的方式來訴求提昇婦女地位時，必須肩負雙重負擔的婦女處於一個公領域的不平等競爭，那麼她的生產力還有辦法和男性比較嗎？在這樣的工作性別配置之下婦女普遍從事薪資低而可替代性高的工作，那麼是否意味著生產力不如男性兩性平等就不可能達到呢？如果兩性平等不會因為婦女減輕投入生產而達到，那麼一胎化政策還有可能因為婦女地位提高而削減性別人口比例失調的壓力嗎？

一胎化政策中的性別理論基礎在於，婦女將會藉由再生產的減少而投入生產，這樣的過程會使婦女經濟自主、地位提高，這裡的再生產所意指的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再生產，但是再生產的意義不只是生育而已，它也包括了勞動力的再生產，當我們把再生產的意義加以擴充、豐富時，一胎化政策的論述是否依然能夠成立？婦女和家庭之間的關係是否真的可以因為生育數量的減低而鬆動，婦女所面臨到的社會結構是否可以因為生育的減少而改變？

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論辯或許只是馬克思整體生產體系觀念中的其中一環，但是對於長期被定位在私領域的婦女來說，公私領域之間這一道看似低矮的

磚牆，卻是連結了整個社會結構縮影的父權障礙。

第一節 婦女與生產的理論根源

在中共的性別意識形態中，我們企圖抓住某些關於再生產相關的線索。在前文已經提及，中共的性別意識是以馬克思主義中的婦女論述作為中心思想加以擴張、衍伸，也因為在馬克思主義中所存在的那種歷史主義式的龐大視角，每一個時代都是歷史性的，每一段時期的社會都是站在過去的基礎之上建築未來，未來可以摸索，進而預測，甚至是以人的意志加以創造，於是當代或者當下的社會便成了整個時間縱軸上的一塊意義拼圖，由領導人宣讀其目標。婦女解放的階段也如是的，雖然中共基本認同婦女必須解放，兩性必須平等，但是這個解放與平等也有一段進程。雖然，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中共的領導人或是思想家像是論述社會主義天堂如何到來那樣地詳細分析婦女要經過何許的歷史階段才會達到解放，馬克思的婦女論述中只給了我們一個很遙遠的星光，那就是當全人類的幸福達成時，婦女的解放與幸福也才能夠達成。

不否認婦女問題的重要性，但是也不允諾婦女問題的急切性。婦女解放的過程沒有藍圖，它的過程就是社會主義理想實現的過程，於是在實踐的步驟上，很理所當然的婦女問題的著力點和當前國家所要努力的方向是合而為一的。中國共產黨強調，婦女受到四權（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壓迫，這些根源都是來自於生產資料私有制（毛澤東，1926），而要解放婦女就必須實現階級解放和社會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動員婦女全面參與社會發展。經濟建設是婦女發展的中心要務，婦女必須參加生產，成為生產大隊當中的生力軍，毛澤東在「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中首次確立了婦女「以生產為中心」的方針，而鄧小平在「六大」中，也將婦女運動的目標定調為「以經濟建設為重心」，婦女運動必須要「勤儉建國，勤儉持家」（人民日報，2001/6/23：5）。婦女要解

放就必須投入生產，經濟建設是婦女解放的重心，諸如此類的論點主宰了改革開放以前中共婦女論述的重心。

前已述及，一胎化政策與改革開放的龐大架構幾乎是同時啟動的，因此，一胎化政策中的婦女論述勢必也要帶著改革開放的形象，雖然同樣是強調經濟獨立、生產自主對於婦女地位的重要性與必然性，但是這和改革開放以前的強調已經絕然不同了，最直接也最顯然可見的一點便是，國家的勢力範圍大幅度縮小，國有的工廠、企業不再能夠涵蓋所有的生產力，國家無法提供一個具有保障的公領域工作給婦女，因此國家必須藉由關愛女孩、幸福工程等等措施來從旁輔助婦女，增加婦女的生產力。在這樣的基礎上，一胎化政策從很多角度來說，它都是一個和婦女生產力直接聯繫的政策。讓我們再重述一次中國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的談話，「重男輕女的觀念所以根深蒂固，既有傳統文化觀念的深遠影響，也有客觀存在的實際困難和問題，既是勞動力的需要，也是養老的需要。（中略）必須從發展經濟、脫貧致富抓起，通過建立有利於計劃生育、有利於女孩及其家庭的利益導向機制和社會保障制度 幫助貧困母親脫貧致富，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提高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這是“關愛女孩行動”的治本之策。⁴⁴」

一胎化的重點其實就是要提高婦女的生產，而面對一胎化政策所帶來的種種激烈化性別問題，中共所企圖的解決道路也就是提高生產。勞動生產，對於婦女來說是無比重要的一件事。生產等同於貢獻等同於地位，這樣的命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參加社會勞動生產本身，就是婦女解放的基本條件（陳信瓊，2000）。

將進入公領域的生產關係視為婦女解放的首要條件，這樣的想法可以追溯至

⁴⁴ 「關愛女孩行動：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在全國關愛女孩行動試點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人口網。

恩格斯，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論述中最直接、也最經典的討論婦女地位的著作。在恩格斯的論述中，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出現起因於私有財產，男性要掌握下一代基因的純潔性，以確保財產的繼承。在這種社會經濟的轉化過程中，

「料理家務不再具有公共特性，不再和社會有關。它成了一種私人的事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僕，被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直到現代的大規模工業來臨，如果她們仍負擔家庭私人事務的責任，她們一樣被排除在公共生產之外，不能有什麼收入；如果她們願意參加公共勞動，獨立賺錢營生，那就無法履行家庭義務」（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72）

因此，關於婦女地位的提昇恩格斯提出了兩點解決辦法，第一，婦女要進入公領域的生產活動，第二，生產資料應該轉為公有，核心家庭不再作為社會的經濟單位。如此一來，家務勞動以及養育工作將成為公領域的事務，婦女也能夠更好的投入生產。恩格斯的論點逐漸成為後來馬克思主義與共產國家規劃婦女解放路徑的重要基礎，不論是列寧（Lenin）或是盧森堡（Luxemburg）也都贊成這樣的觀點。（刁曉華譯，2003）。

基於這樣的理論繼承基礎，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共產黨是存在著性別意識的，而且此性別意識具有相當容易觀察的內在系統以及意識形態的特性，它們是有理論、有方向的去對婦女情況做出解釋，這些解釋散落在各式與性別相關的法案與組織之中，而江澤民在 1990 年所發表的「全黨全社會都要樹立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可謂是最能夠具體說明當代中共領導人對於婦女解放態度的文件。相較於以往的領導人，江澤民對於婦女的處境與未來做了更細微的解釋，並將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做了五個歸類：

第一、婦女壓迫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社會現象；

第二、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婦女壓迫是階級壓迫的特殊

形式，婦女解放必須伴隨全體被壓迫階級的解放而實現；

第三、人們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歸根結底是尤其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決定的，參加社會勞動是婦女解放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

第四、婦女解放長期的歷史過程，不僅受生產關係制約，也受生產力水平制約，不僅受物質生產水平的影響，也受精神文明程度的影響；

第五、婦女在推動人類文明、社會發展中有偉大作用，在人類自身生產中，婦女更具有特殊的價值，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因此應該受到尊重和保護。（江澤民，1990）

在這樣的歸納中，除了重複馬克思主義中對於婦女解放的時間表之外，在第三點，中共強調社會生產對於社會與家庭地位的重要性，葛彬（2001）與虞花榮（2004）皆認為強調參與社會生產的重要性其理論根源來自於恩格斯要求婦女重新回到公共生產的想法。這樣的想法體現在一胎化政策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胎化政策中對於性別的認知便是在於不斷的強調生產的意義，婦女不斷的提高生產能夠提高其社會地位⁴⁵。在第六屆婦女代表大會工作報告上也指出，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決婦女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必須把維護婦女利益同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統一起來，促使婦女工作自覺地服從、服務於改革和建設的全局，發動廣大婦女積極投身改革和建設的實踐。 .（中略）必須根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特點和規律，更好地代表和維護婦女利益。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形成的過程中，存在著新舊兩種體制的碰撞和交替，多種所有制、多種經營形式和分配方式的並存和競爭，各種社會利益關係的矛盾和協調。為了更好地維護婦女利益，必須在有利於社會主義商品經

⁴⁵ 1995年江澤民在全國計畫生育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他指出「我國婦女擔任著社會生產和人類自身再生產的雙重責任，要做好人口與計畫生育工作，必須做好婦女工作，努力提高婦女地位。」（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

濟發展的條件下，建立保護婦女利益的新機制。⁴⁶」

婦女進步的基礎在於配合社會的經濟發展，而改革開放時期的重要社會政策之一便是人口的素質提昇。一胎化政策是在這樣的時、空基礎之上發展，它不斷的訴說類似的邏輯，也就是婦女和生產之間的關係。雖然，我們仍然必須清楚的認知到，即便中共的婦女論述是認為婦女發展和經濟生產之間有著不可替換的必然關係，但是一胎化政策的創始之初，婦女的處境並不是他們所優先考量的點。就如同婦代會的工作報告所指出的那樣，「促使婦女工作自覺地服從、服務于改革和建設的全局，發動廣大婦女積極投身改革和建設的實踐。」在中共的規劃中，就如同第二章中所指出的，婦女地位和國家的總體目標將是一種和諧的聯姻，在這種良好互動的關係中，國家的發展必然會提高婦女的地位，而婦女的地位提昇也必然依賴著國家的發展。所以當我們要看待一胎化政策的角色時，我們應該看見的是一胎化政策在國家發展以及國家所想像的婦女地位之間，發生了什麼樣的作用，而很明顯的，這個作用將與生產息息相關。

在這樣一整套的性別意識形態邏輯之下，從宏觀的角度上來講，一胎化政策因為可以促進國家的發展，民族的興旺，因此必然有利於婦女，而婦女也應該要加以配合；從微觀的角度上來說，一胎化政策解放了婦女的勞動力，它方便國家將富餘的婦女勞動力從私領域中帶出來，此舉在婦女解放的意義上來說有益於婦女經濟地位的提昇。要求婦女進入公領域勞動，接觸生產關係，這樣的主張其實是和許多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主張不謀而合的，例如 Heidei Hartmann 便認為，「父權社會最基本的物質基礎是男性對女性勞動力的控制。不讓女性取得重要的生產資源(如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薪資工作)，並且限制女人的性。」(范情譯，1999) 在這樣的解釋下，婦女進入生產無疑是反抗父權最重要的首發點。

⁴⁶第六屆婦代會工作報告，「自尊自信自立自強 為奪取改革攻堅階段的勝利建功立業——在中國婦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中國婦女網。
<http://www.women.org.cn/zhongyaowenxian/fudaihuiwenjian/di6jie/gongzuobaogao.htm>

無可置疑的，在經濟決定論的角度下，婦女是否參與生產，是否可以接觸到生產工具成爲了最爲重要的徵節點，但是在恩格斯或是 Hartmann 的論述當中，婦女之所以沒有辦法從事公領域的生產工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爲被限制在家庭的領域當中，婦女因爲在私領域從事再生產的工作而與社會隔離，因此，當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詮釋婦女解放的過程時，如何進入生產的過程固然重要，但是「如何脫離再生產的束縛」才是應該受到最大關注的點。一胎化政策可以視爲減輕了婦女再生產的負擔，但是它可以等同於再生產壓力的消解嗎？中共不斷的強調了生產的意義，卻忽視恩格斯要求家庭束縛解脫的觀念，潘錦棠指出，在馬克思關於婦女參加公共勞動的討論中，基本條件是個體家庭不再成爲社會的經濟單位，然而中國的經濟發展還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大量的婦女下崗便是證明（潘錦棠，2000）。

Kyung Ae Park（1995）認爲，雖然中共在二大時便已經將婦女解放的要求放進黨章，但是隨著不同歷史時期的演進，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包袱反而成爲了婦女解放的限制。當國家企圖繼續追求發展時，改革開放「包產到戶」的種種措施又重新讓「家」成爲社會中最主要的經濟單位，這讓許多婦女回到家庭生產之中，走回了原點，這也是一胎化政策之下嚴重性別偏好的原因之一。1983年4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提到了這樣的現象，「隨著農村各種生產責任制的落實，有些農民認爲『土地包了產，生娃你莫管』，又想多生孩子了」。農民認爲人多就是田多，生孩子的慾望更強烈，尤其是生男孩子（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

在中共的一胎化性別邏輯中，它認爲降低生育便會提昇生產，從此提昇婦女地位，然而這樣的基礎是建立在婦女所投入的生產必定是屬於公領域的生產，但是改革開放的經濟邏輯卻是允許更多個體經濟與國有經濟並存，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提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生育數量的控制等不等同於婦女再生產

壓力的減輕，一胎化政策至今已經實行二十多年，它對於減輕婦女家庭義務的效果如何？第二，即便是再生產的負擔減輕了，婦女所投入的生產必定是公領域的生產嗎？如果婦女所投入的生產還是以家庭作為經濟的單位，例如 Kyung Ae Park 所指出的「家庭經濟」，那麼這究竟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第二節 生產與再生產的論辯

在討論父權與生產關係的討論中，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對此都有相當多的著墨，前者將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都視為是性別宰制的肇因，如 Jaggar 與 Hartmann，而後者將火力集中於資本主義霸權與父權的連結與上，如上野千鶴子與 Benston 等人。這兩種方式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的瞭解父權與社會結構、生產關係所串連的本質，但是正因為他們的矛頭都指向了資本主義，我們不禁質問，難道社會主義改善了階級關係，要求女性走入生產，就不會出現相同的問題嗎？

在過去的女性主義文獻中，我們已經很習於探討資本主義和父權之間的關聯，但是關於社會主義和父權之間的討論卻少有實際的批判，使用現象來批駁理論中所呈現的謬誤。當然，這也多少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隱晦性與強制性使其難以接觸。中共的一胎化政策可不可以作為我們的一個觸角，一個實際的案例，以此作為一個基點觀察馬克思主義婦女論述的實踐過程？當我們認為，現在的父權型式跟資本主義有著不可切割性時，我們不禁也要質問，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中，是否也和父權有著相當深刻的連結？

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中，曾經將生產與再生產做出如下定義：

「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是直接生活的生產

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集為此所必須工具的生產；另外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72）

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上野千鶴子則將「再生產」更細分的做出了三種定義。第一，它指的是生產體系本身的再生產。第二，它也指勞動力的再生產。第三種定義也是在生產最為被廣泛運用的定義，人類生物學方面的再生產（劉靜貞、洪金珠譯，1997）。生物學方面的再生產定義自是相當清楚了，然而什麼是生產體系的再生產與勞動力的再生產？上野千鶴子指出，所謂的「市場」並不是單獨存在而自我運行的，它事實上一方面必須依賴自然環境提供資源以及收容其生產廢棄物，另外一方面則依賴家庭提供勞動力，並照養老人、病人以及殘障者。在這樣的解釋之下，作為主要家庭工作負擔者的女性事實上是接收了市場所不需要的人，並再生產新一代的勞動力供資本家使用。

家庭是資本主義中最為重要的經濟與人力單元，它接收了市場不需要的勞動力，維持現有勞動力的繼續運作，並且再提供下一代的勞動力，這一整個循環其實都是再生產的一部分，不單單只有生物學上人類種的繁衍而已。而婦女在家庭當中所付出的勞動力在馬克思的定義當中都只是具有「使用價值」，而非可以消費的「交換價值」，這便是 Hartmann 認為父權剝奪了婦女勞動力的理論基礎。而要撼動這樣的社會結構，婦女必須進入公領域，接觸生產工具，得到有薪資的工作。當我們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待中共的一胎化政策時，一胎化的許多訴求看來似乎是合理的，因為婦女的確是減輕了再生產的負擔並且可以進入生產，但是如果我們將再生產的的意義更進一步討論時，這中間便浮現出很大的闕漏。

Kyung Ae Park 認為家庭經濟的復甦是讓婦女走向原點的原因，而在恩格斯的看法裡，婦女要解放的前提之一也是家庭的崩解，當家庭不再作為社會基礎單位時，婦女也可以脫離家庭。脫離家庭的過程意味著脫離了家庭所賦予的沉重義

務，這包括家庭勞動以及養育的工作。許多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在針對資本主義進行分析時都曾經強烈的抨擊資本主義家庭的意義，例如 Margaret Benston 便認為女性在家務之中的勞動是一種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女性的勞動成果並不能夠出售是她所以被宰制的主因，除非這些家務勞動可以社會化，否則即便是婦女也投入公共生產，也只不過是兩頭奔命而已（刁曉華譯，2003）。婦女必須減輕家庭義務的壓力，而家庭義務包括了養育與家庭勞動。

一胎化政策自 1979 年實行至今，已經經歷了二十多年，2001 年時更將其具體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一胎化政策對於人口的控制是卓有成效的，中國的人口生育率顯著下降，直至現在僅略高於 1⁴⁷，但是就在 2001 年所舉辦的「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主要資料報告」中卻指出，與 1990 年相比，城鄉男女兩性每天用於家務勞動的時間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由女性為主承擔家務勞動的格局仍未改變。有 85% 以上的家庭做飯、洗碗、洗衣、打掃衛生等日常家務勞動主要由妻子承擔。女性平均每天用於家務勞動的時間達 4.01 個小時，比男性多 2.7 個小時，兩性家務勞動時間的差距僅比 1990 年縮短了 6 分鐘。城鎮在業女性每天的家務勞動時間平均為 2.9 個小時，仍比男性多 1.6 個小時⁴⁸。很明顯的，生殖數量的控制並不等於家務負擔的減輕，這和恩格斯所描繪的婦女情境是有相當程度的落差的，當婦女的再生產負擔依舊存在，鼓吹生產的意義是否只是造成了婦女「獨立自主的雙重負擔」？

Gary S. Becker 指出，因為家事的負擔使得婦女對於職場的精力投入較男性為低，再加上性別歧視的因素，婦女的所得普遍低於男性，而且也因為家事的負擔，婦女會傾向精力密集較低的職業與工作，這使得兩性即便是工作同樣的時

⁴⁷ 林毅夫，「人口與經濟發展：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人口經濟學」，中國人口網。
http://www.chinapop.gov.cn/rklt/rkyjhsyyj/t20060205_55585.htm

⁴⁸ 「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主要資料報告」，中國婦女網。
<http://www.women.org.cn/wenjianku/fujianfile.jsp?barid=1&dateyear=2001>

數，擁有同樣的市場資本，但是家事負擔所導致的職業分工仍會使得婦女的薪資低於男性（Becker，1997）。而 1991 年「當代中國婦女地位調查資料」顯示，城市妻子的收入平均為丈夫的 85%，而農村的妻子收入則為丈夫的 60%，體力勞動的婦女佔了婦女就業人口的 93.2%，這表示多數婦女從事的是層次較低的職業，尤其是農村婦女（孫淑清，1995）。因此，如果我們不著重於父權的影響性，而僅強調生產的重要性以及其與婦女地位的關聯，那麼我們就很可能再度回到第三章所討論的那種本質論式的生產力爭辯：為什麼在生育上會有性別偏好，是因為婦女的生產力比男性低嗎？

如果我們可以同意這種本質論式的爭辯一點意義也沒有，那麼是否我們也可以質疑，強調婦女的生產力，試圖從生產力的面向來解決性別選擇性生育的問題，也許並不是一個全然正確的方法。因為即便到了 2001 年，中國不贊同出嫁女兒可以和兄弟平分家產的人仍然高達 74.3%⁴⁹。不管婦女的生產力如何，中國家庭依然傾向由男性來傳宗接代，在這樣的基礎上，性別選擇性生育的問題很難藉由生產力的問題來加以解決。

另外，正如同潘錦堂與 Kyung Ae Park 所指出的，在馬克思主義論述當中，婦女要進入生產並且因此而得到解放，最重要也最基礎的一點是在家庭不再作為社會的基礎經濟單元，因此當中共改革開放，在商業上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在農業上推行包產到戶時，家庭的經濟意義並沒有得到改變。而這便又牽涉到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即便是婦女投入了生產，但如果她所投入的並不是公領域的生產（在恩格斯的共產社會假設中，私有經濟體制已經消滅，因此一切的生產活動必然是公領域的），婦女的工作場域還是在以家庭為主的個體經濟中，這樣的生產也會帶來地位的提昇嗎？

⁴⁹ 「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主要資料報告」。

以農村的變化為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影響除了包產到戶外，也帶來了農村快速工業化的發展，這包括了鄉鎮集體企業的興起，也有家庭工廠的出現。當我們討論家庭經濟時，家庭工廠也許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案例，因為鄉鎮企業畢竟有其集體性質，屬於公領域的範疇，而家庭工廠屬於夫妻合夥制的實體，其性質介於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許敏敏（2002）指出，家庭工廠的產權為家庭所有，它和傳統的家庭經濟（如農業）有許多的共同之處，例如是以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生產地點在家庭內，而夫妻的分工則與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很相近，男性負責聯繫業務，與外界打交道，而女性則負責日常的管理。在這種情形下，雖然家庭工廠提供了一個管道讓女性接觸外界的事務與得到自我肯定，但也因為地處家庭的空間範圍而沒有薪水等報酬，類似於傳統的家庭婦女，雖然創造經濟效益，但是並不計算在產值之內，並且在許多情況下要受到丈夫主導，政治參與的過程也多所障礙，其勞動經常就是家務勞動的延伸。

而作為傳統家庭經濟的農業來說，也普遍具有這種內外區分的趨勢。截至2006年為止，在農業生產中，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的比例達73.4%，中國的農業呈現出普遍女性化的趨勢⁵⁰。杜潔（2004）指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會鼓勵婦女創收，婦女經濟收入增加會提高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是，不能將婦女對家庭經濟貢獻增加或婦女掌管家事等同於婦女地位的提高。雖然婦女的創收增加了，但並沒有與家中男性平等受益；婦女雖然承擔了基本的農業生產任務，在經濟上成為增產創收的主力軍，但是她們的政治地位並沒有隨之相應地提高，社會仍對她們的能力和貢獻持有偏見。而僅僅把婦女掌管家中的“錢匣子”作為婦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也掩蓋了家庭成員在獲取和享有資源上的不平等。研究表明，婦女雖然負責家中的開支，但是通常把丈夫和孩子的花銷放在首位，而捨不得給自己的發展進行投資。還有研究顯示，在家中“大事”上還是男人說了算。所以，婦

⁵⁰ 「我國超過八成農村婦女對生活充滿信心」，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economic/txt/2006-11/23/content_7397476.htm

女掌管家中財政並不能直接說明婦女在家中的地位。很多婦女反映由於負擔加重，很少有時間參加公共活動。由於勞動場所和活動範圍的局限，一些婦女更多局限于家庭經濟，很少時間建立社會網路，這對婦女參與公共事務很不利⁵¹。

而即便是實施包產到戶的制度，農村女性的收入還是相較男性為低，農業比較收益不高和農業勞動的女性化趨勢，是農村婦女收入低於男性的主要原因，男性傾向從事獲益較高的非農工作。從事純農業勞動的農村婦女比例為 82.1%，比男性高 17.4 個百分點。而兼營非農性生產經營活動的男性為 35.3%，比女性高近一倍。農村婦女從事非農性生產經營獲得的報酬為總收入的 13%，比男性低 9.6 個百分點⁵²。農業的女性化呈現的其實是另外一種因性別而區隔的職業劃分。

諷刺的是，雖然男性普遍傾向獲益較高的非農工作，農業勞動普遍的女性化，但是當初允許農村生育二胎的原因正是因為認為「女性的生產力不足」。1986 年的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便提出，

「除了過去規定的一些特殊情況可以生兩個孩子以外，要求生二胎的獨女戶，間隔幾年後可允許生二胎。實行這個政策，決不是從重男輕女的觀念出發的，而是實事求是的考慮到，目前我國農村生產力水準還比較低，家庭還是生產單位，一個農戶只有一個女孩子，在生產和生活上確有實際困難，允許農村獨女戶有計畫地生二胎，將使我們的政策更能行得通，而且有利於減少計畫外多胎生育，實現控制人口的目標。」（楊魁孚、梁濟民、張凡：1997）

關於一胎化政策中論證女性生產力的矛盾已經不需要多說了，家庭工廠與包產到戶的例子讓我們發現，即便婦女從事生產，如果她不是走出家庭的話，她所

⁵¹ 杜潔，「村務管理，婦女地位的重要標誌」，中國婦女網。

<http://www.women.org.cn/allnews/04/66.html>

⁵² 「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主要資料報告」。

作的生產其實還是算在家庭經濟中，而這樣的家庭經濟普遍來說還是以男性為主的。雖然這提供了一個機會改變婦女的處境，參與部份的公共事務，和以往的模式很不相同。但是所謂的再生產減低而生產提高的過程，所提高的這一部份生產並不代表就是全面的回饋給婦女，它的成果更多的是回饋給家庭，或是作為家務負擔的延伸工作。在農業婦女化的情況來看，婦女更像是相較於男性較低等級的勞工而已。上野千鶴子認為，再生產的降低並不能夠保證婦女可以走進公領域，讓婦女走進公領域的是因為產業的轉變，對於人力的需求增加。這樣的角或許也可以給我們一個思考的契機，再生產的降低，不等於婦女會投入公領域的生產，就算投入公領域的生產，也不直接等於婦女地位的提高。當婦女的地位不會提高的時候，婦女的生育選擇不會因此而性別中立，父權的影響力不會因此明顯降低，那麼，一胎化所激烈化的性別選擇性生育，怎麼可能因為它所內涵的性別意識形態邏輯而將中國帶回一個性別平等、均衡發展的社會呢？

最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訴求婦女要進入生產，並不同於要婦女提高生產力，這兩者是存有很大的區別的。**Hartmann** 要求婦女要接觸到生產工具進入生產時是訴求婦女得到經濟的力量自主。雖然在中共的案例中，中共同樣是鼓勵女性接觸生產資源，但是這也正形成了重要的弔詭，即便是接觸了生產資源，它也可以是父權的。當強調生產力的比較時，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對於女性之所以受到壓迫的物質解釋便在這裡受到了轉化，中共同意關於婦女與物質基礎的論述，婦女的確是因為沒有接觸到物質基礎所以被宰制，所以婦女必須投入生產以提昇地位，但是在許多的情況中，重男輕女的原因正是因為女性的生產力表現不佳，不如男性。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對於女性受壓迫基礎的解釋在這裡巧妙的被本質化，爭論的戰場被拉到了男女公領域生產表現的比較，男女都一樣好，女性之所以會受到宰制是因為傳統文化的影響，所以女性要提昇自己的生產力，但是女性要提昇生產力這一句話同時也意味著女性的生產力是不夠的，是和誰比起來不夠呢？標準是什麼？答案不言可喻。另一方面，因為過度強調在公領域中生產

的意義，婦女對於私領域再生產的貢獻、在家庭當中無償勞動的付出也被略過不提、一筆勾銷。Hartmann 的本意是要藉由物質基礎的變化而改變現存的社會制度與權力結構，並藉此改變父權。但是至此已經全面轉化，女性即便掌握了物質基礎，也不必然就要衝擊到社會制度與權力結構，當結構不需要改變時，父權會不一樣嗎？這留給我們一個無比巨大的問號。

小 結

在中共的一胎化論述中，它所體認到的再生產其實是一種窄化的再生產關係，只限定於生殖本身，在這樣的構想中，女性因為生殖時間的縮短，於是便可以投入生產。女性被視為是一個必須同時負擔生殖成本的勞動客體，於是在固定的生命歷程與能力中，生殖時間的縮短被等同於生產能力的增加與延長。但是再生產的壓力並不是僅僅有生殖的壓力而已，當國家觀看婦女時，只著重其作為生產者的角色，例如在幸福工程中，它看見的是已經可以作為生產者的母親，以及關愛女孩計畫中，它看見的是即將作為生產者的女孩，這兩個計畫的共通點都是可以增加婦女的生產力。國家藉由生產者的這一個角度進入了私領域，但是婦女作為生產者並不代表她不會同時間也作為再生產者。再生產的意義並不僅止於生殖而已。

當一胎化政策將婦女自家庭拉入勞動市場時，國家強調的是女性作為一個生產者的角色。國家希望簡短母職負擔的時間，使婦女可以將更多的精力投入於生產之上。在性別意識形態中，中共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論述也不斷的強調婦女地位與經濟之間的關係，這種強調在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中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人都要經由勞動的過程而賦予成為人的價值。但是事實上，一胎化政策所面對的種種困難卻是，儘管國家認為女性是生產者，而且必須更加的投入作為一個生產者，但是父權在看待女性時卻還是將她視為是一個再生產者，婦女還是必須負擔龐大的

家務勞動。以父權的角度來說，生育女性的生產價值是比較低落的，因為她能夠從事的生產終究較男性為低，並且，當結婚後婦女便是一種分離性的生產力，不再屬於自己，也無法繼承家產。國家並不準備和父權有所衝撞，國家並沒有要挑戰父權將女性視為再生產者的態度，它只是藉由種種的利益措施加強了女性作為一個生產者的力道與能力，因此，如果生產跟再生產並不具有一種加減關係的話，這樣的論述其實是不成立的。

在這裡，針對男女生產力是否一致、男性的生產力是否較女性優越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如果我們可以說女性受到歧視或是掌控都源自於她的生產力較低，那麼一切的社會不平等現象都不需要進行討論，因為所謂的生產品標準便是由優越者訂立的，像是這樣的論述反映出中共政策中的性別盲點。國家一開始並沒有考量到父權的影響力，中共的反父權是一場沒有敵人的戰爭。他要求婦女更多的投入生產，背後的邏輯卻是婦女必須達到更多的生產力，至少，是和男性一樣的生產品力才能夠達到男女平等，男女的平等、婦女的地位的提高，必須依賴婦女生產力的提高，然而這一的論述卻隱藏了一個危機，那就是當中共這樣指稱時，他便隱含了將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本質化的弔詭。而這種將男女兩性本質化的論述讓中共在強調男女平等時，不需要直接的衝撞父權。父權的一些表徵再這些過程中好像得到了消解，畢竟，婦女也有了工作，婦女也有了自己的經濟實力，但是父權的制度卻不需要受到直接而衝突的挑戰。

並且，當我們從一種歷史的高度來檢視一胎化政策中的理論基礎時，可以發現，不管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論述或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他們的討論重點，婦女解放的輪廓模型，其實都是建立在社會主義之上（馬克思根本是建立在共產主義之上），這樣的描述輪廓要婦女投入生產地位便會提高，那是因為有一個假定，一切的生產品都是公領域的，但是當中共改革開放，經濟型態轉變，家庭又重新作為一個社會的基本單元時，婦女所投入的生產品不一定就是公領域的生產品，如果我

們還是依照馬克思主義婦女論述這樣的邏輯繼續去推導，那麼，非公領域性的生產就都還是隱形的，一胎化政策中婦女與生產的的自我迴圈邏輯也就不能夠成立。中共一方面以鄧小平的定義將目前的歷史階段設定為社會主義的初階段，所以公私並存的產業制度是合理的，而社會主義中的市場經濟也是可以接受的，婦女解放的成果也應該是被放在這樣的角度來加以衡量。但是另一方面，在解釋現行政策的理論根據時，卻是以一個不符合社會現狀的社會主義理想來加以詮釋婦女運動的目標，這種理論與現況的落差，想像與真實的倒錯，使得一胎化政策的性別視野一開始就是塵煙漫布，跌跌撞撞。

雖然我們不能夠否定一胎化政策的確是為婦女的處境帶來的改變，而這其中並不乏正面的案例，但是當父權認為婦女還是再生產者，並且，要生育的是男孩，這使得婦女和自己所生育的對象是分離的，不管是要求生育男孩的壓力是都傾注在婦女身上，或者是夫婦都要分擔這樣的壓力，這個過程的本身，要婦女去肯定男孩才是「好」的，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就是婦女會覺得自己的性別並不「好」。而這種自我降格的過程，無疑就是最大的異化。